

追念梁寒操兄

鄧公玄

不佞不求高山流水誠難仰，
有猷有守明月清風何處尋。

老友梁寒操兄逝世後，海內外以詩文詠之者衆矣，我曾以上述一聯輓之。回憶我與寒老（友輩以寒兄有少年老成之風，數十年來，多以寒老稱之）相交近五十年，謹就個人與其過從之若干事實書之於次，或亦足發其幽光於萬一乎？

我之得識寒老，始於十七年秋，是時我方隨孫哲生先生由美返國，適國府開始實施五院政制，孫先生膺命出長鐵道部。但友好咸促我進行第一屆立法委員，於是入京晉謁孫先生於鐵道部籌備處，意欲求其介荐於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先生。哲公延我至其辦公室就坐，然不即接談，而仍持報閱讀，我以為哲公或有不悅，方將興辭而去，忽見哲公放下報紙問我曰：「聞你要進行立法委員是嗎？」我初不意其有此一問，因曰：「此是朋友們的意思，我自己殊無成見。」哲公乃曰：「那麼，我想請你來幫忙好嗎？」我曰：「過去一向蒙先生提攜，倘先生有所差遣，敢不遵命。」哲公立刻起身與我握手，並曰：「你來做我的秘書

何如？」我表示接受之後，哲公又呼工友入門，曰：「請寒操來」，寒老入門後，哲公對他說：「公文作我的秘書，今後你們要好好的合作。」寒老亦立即與我握手，表示歡迎之意，此為我與寒老共事訂交之始。

寒老當時與我同任鐵道部秘書，過從漸密，即知其為休休有容之恂恂君子。在鐵道部時期，寒老不久即升任參事及司長，而我則一度調任交通大學訓導長。十八年秋，我再調鐵道部秘書兼編譯科科长，於是寒老與我共組「天職」周刊社，由我負責，寒老除經常寫作外，對社務支持最力。二十二年一月，孫哲公出長立法院，寒老以立法委員兼任秘書長。我亦忝膺立法委員之命，與寒老均被指派為憲法案案委員會委員。寒老贊襄哲公，協和院務，其處世接物之長才，尤能充分表露。當此之時，訓政伊始，百端待舉，於是前孫文主義學會同志與有志國父遺教之青年，在京共同發起「中山學社」之組織，寒老亦為出力甚多之一人。中山學社成立後，寒老當選為常務理事之一，而我則忝任常務理事兼書記長之職。同時為社員發表有關三民主義之研究與對訓政建

設提供意見計，遂由社出版「中山周刊」，寒老為發行人，而我則被推為主編人。數年間，社務日趨發展，在當時研究三民主義風氣尚未大開之日，中山學社而能獨樹一幟，固亦難能而可貴也。不料七七事變爆發，我政府為實行全面長期

抗戰，遷都重慶。當立法院尚未復會時，立院同人多滯留武漢，我則回湘暫任湖南省戰時設計委員。寒老在漢，促我返漢恢復中山學社活動，我遂由湘至漢，與寒老等繼續「中山周刊」之發行。二十七年春，立法院在渝復會，我復攜學社重要檔案至渝，同時亦照常出版中山周刊，竭力為長期抗戰國策作鼓吹。

是年秋，重慶有「新經濟」周刊之出現，其創刊號載蔣廷黻所作「百年外交」一文，我偶一閱讀，因見該文主旨在評論過去百年間我國外交之失敗，認為其主因在我國文人盲目主戰之所致，此種論調顯與我國當時所探長期抗日國策相違。因此我乃撰「評蔣廷黻百年外交」一文，刊之於中山周刊。適是時本黨在渝召開中央全會，本社即將是期周刊分送與會人員。開會時，白崇禧將軍（時任軍委會委員長桂林行營主任）獲讀是

文，大為感動，當同首問馬超俊先生曰：「你認識鄧公其人否？」馬先生曰：「他是我的老友

，現任立法委員。」白將軍又曰：「我讀過他的評蔣廷黻百年外交一文後，深覺他不愧為一政治家，務請你介紹見面。」是晚馬超俊



中美文化經濟協會宴請美國駐台商會負責人留影，前排右起第一人（舉杯敬酒者）為梁寒操，後排位於兩美國來賓間者為本文作者鄧公玄教授。

先生即訪我於重慶青年會宿舍，將白將軍之言相告，並囑我於某時與其會晤。然次日，馬先生以電話告我，謂白將軍因前方軍事告緊，業已飛桂，晤談之事，暫行作罷。

忽一日，梁寒老身著戎裝來青年會宿舍訪我，（是時寒老已調兼桂林行營政治部主任之職）云剛由桂林返渝述職，此來目的，在代表白主任向我致意，又云：「白將軍上次託馬先生約見見面，因匆匆飛桂，致未如願，甚以為歉。而且白主任意，想請兄赴行營幫忙。」我向寒老曰：「我與白將軍素昧生平，承他不棄，固甚感激，但不知其要我做什么工作？」寒老即曰：「聽說他請你做他的秘書，少將階級。」我聞後，乃答之曰：「我做秘書工作業已厭倦了，今後無意重作馮婦，請兄代謝白將軍的厚愛。」寒老再三敦促，我仍執前意，寒老知不能相強，遂興辭而去。但數星期後，寒老忽又來訪我，並曰：「白主任仍要請你去幫忙，他因為你不願任秘書，所以要請兄去作他的顧問。現在是抗戰時期，老兄豈可峻拒呢？」我因見白將軍意甚誠懇，而寒老已兩顧茅廬，遂允之。寒老見我已允，於是再謂我

曰：「請老兄後天早晨即一同起飛，因為余漢謀將軍有專機飛桂林再轉廣州，老兄可不必另覓交通工具。」于是我乃隨寒老及余將軍等飛往桂林。

當我等抵桂林時，白將軍適在前方巡視，數日後始行歸來。白將軍即約我在行營見面，當將其如何要請我幫忙之意殷殷相告，而當晚即設宴款待，席間有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，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，廣西省黨部主任委員李任仁，民政廳廳長邱昌渭及寒老等作陪，而以我為主客，然關於我之工作則尚未安排妥當，白將軍即又匆匆出巡前方。因是我寓樂羣社無以事事，寒老見我如此，乃謂我曰：「行營方面既尚無工作安排，而我政治部主任秘書一職又正乏人，我想請兄暫時代理何如？」我對秘書工作原無再作馮婦之意，但既為暫時代理性質，不得不勉允之。于是寒老即邀我移至其寓同住，寒老桂寓係全城唯一新式小洋房，設備大都頗現代化。除寒老外，寓中尚有政治部同仁司徒德、蕭次尹、劉恨我諸兄，朝夕相聚，至為歡洽，但寒老則經常巡視前方，對軍隊講演，以增密其抗戰意志，可謂席不暇暖，其為國勤勞如此。

不久白將軍復自前方歸來，當約我晤於桂林行營，對我曰：「這次請先生來此，初欲組織一個顧問團，擬以何遂甫為軍事顧問（時何已任行營顧問），先生為政治顧問，同時再物色一人為經濟顧問。但現在情形略有變化，因為原定來此任秘書長之張維翰先生，業已就任內政部周鍾岳部長的政務次長，不克分身前來，所以我不得不

請先生出任祕書長一職。」我曰：「白主任，祕書長責重事繁，難以勝任，還請另行物色高明。」白將軍曰：「我已考慮甚久，此職非先生莫屬，千萬不要推辭。」我見其意甚誠，且我已承命前來，豈有拂袖而去之理，遂允之。由於行營在城內，而政治部辦公室在對河七星岩，兩地相距過遠，當然無法兼顧，不得已遂向寒老辭職。

我與寒老來桂後，關於重慶方面之中山學社書記長一職，我請宋述樵兄代理，而中山周刊則陷於停頓，於是寒老與我等商議，一面在桂林發起中山學社桂林分社之組織，一面則將中山周刊移桂出版。中山學社桂林分社成立後，桂林方面黨政軍學各界人士之參加者甚為踴躍，社員達數十百人之多，而寒老之力為最鉅。

此時有一事足資記述者，是年夏，軍委會委員長蔣公飛桂，白主任適在前方未歸，是我與寒老均接委員長請柬，約於晚間在行營便餐。席間除我與寒老外，有張治中與陳布雷二先生，蓋均隨蔣公而來者。晚餐甚為簡潔，飯後，蔣公囑在客廳茶敘，蔣公當提出一個問題，云：「現在所謂民主人士與共黨方面均主張即行召開國民大會，你們看他們的用意何在？」一時無人作答，蔣公乃轉而問我曰：「你有什么意見？」我當對曰：「委員長，以我的淺見，他們大概是恐怕抗戰勝利後，我們國民黨的威望高漲，到那時，他們說話的地位將會低落，所以他們乘此時機，主張先召開國民大會，使他們的說話地位和國民黨的地位，得以彼此平衡。」蔣公聞之，連連稱是，其喜悅之情溢於言表，而寒老與張、陳二先

生亦均表同意。

迄二十九年初春，我與寒老均隨白將軍飛渝，而以為即將重返桂林，但抵渝後即因桂林行營改組為行轅，其組織與職權均大為削減，同時白將軍出任軍訓部部長，而以李濟琛為行轅主任。寒老與我遂重返立法院工作，結束一年多之從戎生涯。

抗戰勝利後，政府實施憲政，我與寒老均曾參加制憲國民大會，又均當選為第一屆民選立法委員，故在工作上可謂始終同道。惟自大陸淪陷後寒老與我雖先後乘桴來台，然寒老則辭去立法委員而就任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之職，我則仍守立法院之崗位。其後在台友好共同發起「中美文化經濟協會」之組織，以期增進中美關係，寒老被推為理事長，我亦忝任常務理事，遂再得為國民外交之目的而共同努力。來台二十餘年，雖工作崗位

各殊，而彼此返還固不減於當日。寒老因見邇年來美國對華政策每多誤入歧途，常向美國朝野人士提出忠告，往往囑我執筆，而我在立法院提出質詢時，亦常向寒老請益，彼此皆知無不言、言無不盡也。不料寒老竟因心疾驟然去世，當時老友梅恕曾兄以電話告我，使我不啻如聞青天霹靂，而不知涕之潸潸下焉。

自我入世從政以後，即與寒老相交，其間在鐵道部、在立法院、在中山學社、在桂林行營、在制憲國大、在行憲後之立法院、在中美文化經濟協會，幾於無役不同，故對寒老之為人處世、濡染頗深，而其尤足令人心儀者，即其涵養工夫與忠恕之道，為不可及。大學上所謂「其心休焉，其如有容焉，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，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」者，惟寒老有之，求之於今日士林，真可謂鳳毛麟角也。

最新出版：

百山黑水的悲歌

陳嘉驥 著
定價台幣伍拾元

內容包括：俄軍入侵東北、日本關東軍敗亡、國軍出關連戰均捷、陳明仁大奸會似忠、四平街大會戰真象、孫立人杜聿明失和始末、鴨綠江上中俄糾紛、國軍在長春、錦州、遼西失敗經過、葫蘆島撤退等凡四十篇卅萬言，頗多祕辛，並附有珍貴照片定價台幣伍拾元郵政劃撥一〇四八八四號陳嘉驥、海外訂購美金貳元伍角寄台北市龍泉街92號之6。中外雜誌社亦有代售。